

# 他們為何投入美國懷抱？

• 咎 濤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開始商討肢解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開始把美國看成他們最後的希望。1918年末至1919年後半期，有關讓美國託管奧斯曼帝國的爭論在一些土耳其精英中展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開始商討肢解奧斯曼帝國，以懲罰土耳其人。在此情勢下，一些對帝國命運已感絕望的土耳其人，開始把美國看成他們最後的希望。1918年末至1919年後半期，一場有關讓美國託管奧斯曼帝國的爭論在一些土耳其精英中展開，這場爭論的集中爆發是在1919年9月召開的西瓦斯會議上。在以往的土耳其現代史研究中，有關「美國託管」的問題沒引起足夠的重視，大概因為這是一場沒有結果的爭論，對土國歷史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但對此加以深入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曲折。本文主要通過分析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 在其著名的「偉大演講」(Büyük Nutuk) ①中所提及的資料，以及西瓦斯會議上關於「美國託管」問題的爭論為中心，澄清當時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及其原因。

## 一 「美國託管」提出的背景

1918年10月30日，在停泊於摩德洛司(愛琴海上)的英國巡洋艦「阿哈

梅隆」號的甲板上，奧斯曼政府簽訂了停戰協定，是為《摩德洛司停戰協定》(Armistice of Moudros)，這標誌着奧斯曼帝國的徹底戰敗。停戰條件規定：奧斯曼帝國向協約國開放海峽及其要塞，土耳其軍隊除邊防軍和國內保安部隊外一律復員，如果協約國的安全受到威脅，准予佔領其帝國任何戰略要地。

在這種情況下，「對很多人而言，歐洲人監護下的政權似乎成為未來生存的唯一可能。伊斯坦布爾的統治集團相信，既然英國控制着比任何國家都更多的穆斯林，那麼，其卵翼下的穆斯林統一，將成為獨立生存的最好的替代性選擇。理想的條件是：英國成為奧斯曼哈里發的保護國，英國保證奧斯曼蘇丹，給土耳其人(農民)在安納托利亞一小塊土地。」②

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會通過了國聯憲章，其中規定了建立「委任統治」的原則，即對那些尚不能通過民族自決以建立獨立國家的領土，實行國聯監控下的「委任統治」制度。那些盼望着被一個大國託管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於1919年5月20日，在伊斯

\* 本文係經中流文教基金會及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大陸青年學者基礎研究獎助)補助。

坦布爾成立了一個名為「英國之友協會」的組織。在凱末爾看來，這個組織的建立者只關心自己的安全與利益，他們試圖尋求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的保護<sup>③</sup>。但是，當希臘軍隊於1919年5月15日在伊茲密爾登陸後，勞合喬治最終還是支持了希臘人佔領伊茲密爾的行動。這樣，「英國之友協會」一廂情願地巴結英國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早在1918年12月20日，英法軍隊就佔領了安納托利亞南部的阿達納；1919年4月29日，義大利軍隊在安塔利亞登陸。這樣，在「四巨頭」所代表的協約國核心成員中，就只剩下美國人沒有佔領任何奧斯曼的領土了，因此，尋求美國的保護也就成為唯一可能的選擇。

如所周知，早在1918年1月8日，美國威爾遜總統在致國會諮文中就提出了其著名的「十四點計劃」，其中有兩個方面與土耳其密切相關：一、民族自決原則；二、承認土耳其之主權。這主要涉及到「十四點」中的第五和第十二點，第五點說：「對於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當與政府之正當要求共適權衡。此種主義，各國須絕對尊重，不得絲毫假借。」第十二點則說：「對於土耳其帝國之土耳其種族，須承認其主權。其在土耳其政權下之他種族，當享受保護生命、發達自治之權利。」<sup>④</sup>

對已經陷入支離破碎狀態的奧斯曼帝國而言，威爾遜的這個計劃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正如當時的土耳其女作家艾迪卜 (Halide Edib) 在其回憶錄中所說<sup>⑤</sup>：

在威爾遜原則的激勵和鼓舞下，伊斯坦布爾的一些作家、政治家和律師

(於1918年12月——引者) 組成了一個臨時性的威爾遜聯合會 (Wilsonian League)。在盲目的仇恨與「讓戰敗者寸土不留」這樣的傾向盛行之際，人們似乎只能在威爾遜的原則中窺見一絲公正與常識的隱約光明。在醜惡的瓜分陰影之下，開明的土耳其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威爾遜總統和美國，只有他們對土耳其沒有領土之覬覦。媒介的代表們……討論要給在巴黎開會的威爾遜總統呈送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起草了一個計劃，希望美國在財政和經濟上幫助土耳其，派遣專家和顧問來土耳其，保證土耳其一定時期內的和平，並給予土耳其民族組成新的政權並着手內部改革的機會。

當「英國託管」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基礎後，人們開始更廣泛地屬意「美國託管」。其實，不管是讓英國還是讓美國來託管，這些力主被託管的精英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在完全統一的基礎上保留奧斯曼帝國，這些人害怕的是帝國被分裂成幾塊<sup>⑥</sup>。此外，他們還奢望在美國的幫助下實現現代化。

## 二 支持「美國託管」的理由

1919年5月19日，凱末爾來到安納托利亞。他首先領導民族主義者進行政治上的聯合與鬥爭，這主要表現在1919年召開的兩次大會：埃爾祖魯姆大會和西瓦斯大會。

在凱末爾離開埃爾祖魯姆前往西瓦斯之前，他就聽說了關於「美國託管」的倡議<sup>⑦</sup>。凱末爾在「偉大演講」中曾用大量篇幅展示了當時有關「美國託管」問題的電報和文件。在9月4日的西瓦斯大會上，代表們就「美國託

當「英國託管」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基礎後，土耳其人開始更廣泛地屬意「美國託管」。這些力主被託管的精英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在完全統一的基礎上保留奧斯曼帝國，他們害怕帝國被分裂成幾塊。他們還奢望在美國的幫助下實現現代化。

土耳其精英中贊同「美國託管」者有如下幾個理由：一、擔心帝國的分裂；二、認為自身力量不足；三、認為美國是最值得信賴的國家，對美國存在着極大幻想。

管」問題進行了爭論。綜合凱末爾所展示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贊同「美國託管」者有如下幾個理由：

(一) 擔心帝國的分裂：1919年7月25日，高加索第五軍臨時司令阿里夫 (Arif) 在給埃爾祖魯姆大會及凱末爾的電報中說：「原則上，獨立自然是更可取且值得期待的，然則，若我等宣布完全之獨立，帝國無疑將分裂成數個區域。若是，與僅限於三兩個省的獨立相比，可確保我國統一之託管顯然更好。鄙人以為，解決我民族問題之最妥方法莫過於請求美國實行一定時期的託管，這給予我們保留憲法並派帝國代表前往他國之權利。」<sup>⑧</sup>

(二) 認為自身力量不足：在西瓦斯會議上，瑪齊特貝伊 (Macit Bey) 提出疑問：「如果只靠我們自己，我們在將來是否能生存下去？我們應該以甚麼形式接受託管？我們可以與託管國之間達成甚麼協議？誰將是託管國？」<sup>⑨</sup>哈密貝伊 (Hami Bey) 就國家財政困境發言說：「無論發生甚麼，我們必須尋求幫助。這種必要性的基本證據是國家的稅收連償還我們債務的利息幾乎都不夠。」<sup>⑩</sup>萊非特 (Refet) 對此說得更詳細：「在今天，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希臘想分裂我們。但是，如果我們在一個外國的保護下實現和平，一旦時機成熟，我們將能夠根據自身的利益改變這一約束。如果條件變得更糟，我們難道不是可能被徹底摧毀嗎？」<sup>⑪</sup>

(三) 認為美國是最值得信賴的國家，對美國存在着極大幻想。在給凱末爾的電報中，艾迪卜認為，「在美國的傑出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相當同情我們的傾向。很多作為亞美尼亞人的朋友來到伊斯坦布爾的美國人，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已經成為

我們土耳其人的朋友……」<sup>⑫</sup>艾迪卜推斷說：「美國人希望對土耳其進行整體的、不可分割的託管，她希望我們能夠保持原有的領土，不願意土耳其領土的任何一部分被人奪取。」<sup>⑬</sup>

在西瓦斯會議上，萊非特在其長篇發言中說：「我們力圖讓美國託管的目的是，要避免被置於英國的託管之下，因為這將使我們所有的人陷於被奴役狀態，並窒息人民的思想與意識；這就是我們寧可讓美國託管的原因，美國是一個溫和的國家，它尊重其他國家的感情……錢的問題不是最重要的……。」<sup>⑭</sup>

西瓦斯會議之前，在給凱末爾的信中，艾迪卜說，若讓美國託管我們，「我們必須加上一個條款，即確保民族的進步與福祉，要把我們的人民——農民——變成徹底的現代民族。而我們沒有錢也沒有特別的知識和力量來實踐這樣的想法。政治性貸款只能增加我們的依附性。」<sup>⑮</sup>正如曼谷 (Andrew Mango) 所論：「他們不僅考慮到在大戰失敗後奧斯曼國家的虛弱，而且，他們認識到，以『當代文明』的標準來看，土耳其人是多麼地落後。」一個名叫努爾 (Rıza Nur) 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寫道<sup>⑯</sup>：

如果美國託管我們，並作風公正而誠實，那麼，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它就能使我們取得靠自身一個世紀都無法取得的發展程度。它將使土耳其繁榮、富裕而幸福，並將土耳其人變成一個強大而文明的民族。看看英國統治下的埃及吧。在三十年內，埃及的人口已經增長了1,000萬，這個國家是完全地繁榮和有序的，其民族是富裕的。這樣的民族將能夠在一剎那取得獨立地位。至少那是在當前這種絕境

中可以考慮的一種方式。當然，即使在天堂中，奴役也是不好的。但民族有失去一切的危險。這個想法可能是錯誤的，但若說這樣想的人是背叛，也不公平。

艾迪卜在電報中也提到，「美國是唯一一個懂得民族精神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知道民主政制之構成的國家，她還是唯一一個成功地在菲律賓這樣的蠻荒之地創建了現代國家機器的國家。因此，我說，與所有其他的國家相比較，美國是唯一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國家。」<sup>⑩</sup>

### 三 爭論的結果

根據凱末爾個人的敘述，1919年8月19日他在發給富阿特 (Ali Fuat) 的一份電報中，對支持「美國託管」的輿論做出了回應：首先，既然他們要維護國家之獨立與完整，接受美國的託管是否最好的選擇？其次，必須以民族的名義行動，只有得到議會支持並代表民意的政府才有權利處理與美國及其他外國之間的關係問題<sup>⑪</sup>。這裏，凱末爾提出了託管與獨立之間的關係問題，在西瓦斯會議上，爭論的核心就是這個問題。

在西瓦斯會議上，來自伊斯坦布爾醫學院的學生代表們激烈地抨擊了支持託管的主張，一些省代表也加入到抨擊的行列。反對派認為託管將使土耳其失去獨立地位，這與前述凱末爾本人的回應是一致的。在大會上，拉以夫埃芬迪 (Raif Efendi) 反對託管，他說：「……克里木戰爭後，我們參加了巴黎和會——那時我們是戰勝國，我們的盟友給我們強加了一些條

件，你是知道這些的。如果我們把這次動議中的思想與那些條件相比，我想我們應該明白哪個對我們獨立的影響更大。」<sup>⑫</sup>

支持託管派也意識到存在一個「完全獨立」與「託管」之間的關係問題。法澤爾帕夏 (İsmail Fazıl Paşa) 說：「對我們而言，問題很簡單：我們到底是要完全之獨立還是託管？我們要達成的決議其實就是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sup>⑬</sup>萊非特堅持認為託管不會損害獨立，他說：「託管與獨立的思想並不是矛盾的。如果我們不夠堅強，託管將勒死我們，那樣的話，它將傷害到我們的獨立。另一方面，我們都渴望真正地對內對外完全獨立，我們是否強大到足以靠自身來實現之？此外，我們是否被允許按我們的意志行事？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事情。」<sup>⑭</sup>當然，他認為奧斯曼帝國已經無力保持完全獨立了。

但當時也存在另一種主張，即接受託管意味着賣國。沒有人敢於背負這樣的罪名，所以，支持託管的法澤爾帕夏說：「我們三個人：拜克爾·薩米貝伊、哈密貝伊和我本人請求允許撤銷這一動議，因為它已經引起了太多誤解，我們寧可不再討論這個問題。」<sup>⑮</sup>儘管凱末爾作為大會主席宣布撤銷了這一動議，但爭論還是持續到第二天。

在9月8日當天，作為支持派的瓦色夫貝伊 (Vasif Bey) 最後也將「託管」這個詞換成了「幫助」，他說：「即使所有的國家都同意給予我們完全之獨立地位，我們也仍然需要幫助。」<sup>⑯</sup>在他看來，接受「託管」或者「幫助」恰恰是保持未來之獨立地位的必要手段。

9月9日，饒夫貝伊 (Rauf Bey) 則把討論的重心轉移到《埃爾祖魯姆宣

當時也存在另一種主張，即接受託管意味着賣國。沒有人敢於背負這樣的罪名。在西瓦斯會議上，作為支持派的瓦色夫貝伊最後也將「託管」這個詞換成了「幫助」。接受「託管」或者「幫助」恰恰是保持未來之獨立地位的必要手段。

凱末爾說：「在經歷這麼多之後，我們確定美國是一個唯一能夠幫助我們的國家。」但是後來，威爾遜總統支持了把土耳其的領土併入亞美尼亞國家的呼請，這極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對奧斯曼領土進行託管的主張，也就從未被提交到美國國會。

言》(*Manifesto of Erzurum*)中的一個條款，該條款歡迎任何尊敬奧斯曼帝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外國，對土耳其提供援助<sup>24</sup>。他認為，由於其他的列強已經嚴重威脅到奧斯曼的生存，因此，「我們必須接受美國的幫助，只有美國對我們的國家持有最公正的態度。我堅決相信這一點。」<sup>25</sup>

在把「託管」換成了「幫助」後，西瓦斯大會最終同意由凱末爾和大會的副主席們，邀請美國參議院派一個代表團來安納托利亞做調查。有關該問題的信件於9月9日交給了當時與會的美國記者布朗(Demetra V. Brown)，並請其轉交美國的有關部門。由此可見，大會是在一種悲觀的氣氛中進行的。這個決議正說明，無論土耳其人多麼慷慨激奮，也不得不謀求外援。

在「偉大演講」中，凱末爾說自己不記得是否轉交過信件，當然，這只是為了表明自己一直堅持土耳其之完全獨立。哲別索伊(Ali Fuat Cebesoy，即富阿特)說，凱末爾的演講掩飾了一項事實，即的確有一份電報發送給了華盛頓的參議院主席，要求派一個事實調查團。這份電報的文本後來在華盛頓發表了<sup>26</sup>。

歷史是無法掩飾的，美國人哈勃德(James G. Harbord)率領的代表團於9月20日來到西瓦斯。凱末爾告訴他們，土耳其意識到，它需要一個無私的外國的幫助。在同年10月15日的一份聲明中，凱末爾說：「在經歷這麼多之後，我們確定美國是一個唯一能夠幫助我們的國家。」<sup>27</sup>可見，凱末爾那個時候也是接受了「幫助」這個提法的。哈勃德調查團在報告中說：「無論亞美尼亞人是怎麼想的，現在把土耳其的領土併入一個單獨的亞美尼亞國家，則是不明智之舉。」<sup>28</sup>但是，

第二年，威爾遜總統仍然支持了亞美尼亞人的呼請，這極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對奧斯曼領土進行託管的主張，也就從未被提交到美國國會。

## 四 結 論

本文的論述揭示，「美國託管」問題反映出，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初，關於國家的前途命運，並不存在一致的看法；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即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的問題，並未立刻提上日程。

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筆者雖然主要利用了凱末爾本人所提供的史料，但這並不意味着筆者就贊同凱末爾本人的觀點。在演講中，凱末爾拿「美國託管」問題作文章，是為了從意識形態上打擊政治對手，將他們說成是叛國者。從後來的發展看，凱末爾最終靠蘇聯人的援助，在民族獨立運動中戰勝了協約國，特別是希臘。1920年4月26日，凱末爾以「大國民議會」的名義寫信給列寧，建議蘇俄與土耳其建立外交關係，並請求蘇俄援助土耳其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sup>29</sup>。

1938年凱末爾去世，及後二戰爆發。大戰中土耳其保持中立，在戰爭行將結束之際審時度勢地加入了反法西斯一方，戰後很快就加入了北約，投入了美國的懷抱。在冷戰中，土耳其成為「遏制」共產主義蘇聯的南大門，與美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戀人」關係，直到冷戰結束，雙方的關係仍可謂「藕斷絲連」。在這一過程中，土耳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深受美國的影響，也可以說部分地實現了那些曾支持美國託管者的夢想——美國幫助下的現代化。

## 註釋

① 這場演講是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凱末爾於1927年10月15至20日，在共和人民黨代表大會上做出的。其中，凱末爾主要回顧了土耳其民族運動中的重要事件，他運用了大量相關的電報原文和會議記錄，再現了那場轟轟烈烈的解放運動的細節，其中有為自己辯護或粉飾的地方，但若去掉那些觀點性的論述，我們就必須承認這一演講的史料價值。Mustafa Kemal Atatürk, *A Speech Delivered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Istanbul: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inting Plant, 1963).

②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London: Hurst Company, 1998), 432.

③⑥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Mustafa Kemal Atatürk, *A Speech Delivered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5; 8; 73; 86; 87; 88; 78; 79; 88; 77; 77; 85; 87; 87; 88; 88; 90-91; 93.

④ 〈美國總統威爾遜國會演說〉，參見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上冊，第一分冊（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頁381-86；亦見同書之上冊第二分冊，頁397-406。

⑤ Halide Edib, *The Turkish Ordeal*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8), 15.

⑦ 熱衷於「美國託管」的土耳其人包括：「聯合與進步委員會」（CUP）中的自由派人士，還有一些奧斯曼愛國主義者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他們批評CUP屈從於德國的政策，但他們認為離開某個大國的幫助，土耳其無法生存。Andrew Mango, *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Ltd., 1999), 246.

⑧ 轉引自Andrew Mango, *Atatürk*, 246。

⑨ 該條款的具體內容為：「我們國家完全讚賞現代理念，並且充分意識到我們當下之條件，以及我們在科學的、工業的和經濟方面的需要。因此，為了保持我們的內外之獨立以及我國之統一，我們歡迎任何國家的科學的、工業的和經濟的幫助，條件是它尊重我們的民族感情以及第六款所確定的邊界，並對我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之企圖。為了人道和世界和平，基於這些公正與人道條件的和平之盡快實現是我

們的熱切期望。」Mustafa Kemal Atatürk, *A Speech Delivered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91-92.

⑩ 參見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9。

⑪⑫ Andrew Mango, *Atatürk*, 248.

⑬ 米列爾(Anatolii F. Miller)著，朱貴生、蘇苒、王榮宅譯：《土耳其現代簡明史》（北京：三聯書店，1973），頁174。從1918年開始，蘇俄就在考察安納托利亞的革命形勢，後來凱末爾通過自己設立並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共產黨巧妙地取得了蘇俄的信任，並爭取到來自蘇俄的援助；可以明確的是，凱末爾是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他是個實用主義者；同時，在海峽問題、泛突厥主義問題上，蘇俄也需要土耳其的支援，雙方可謂各取所需。但自始至終，凱末爾的原則就是維護土耳其主權的獨立與完整，而不是在土耳其搞社會主義革命，蘇俄開始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這一點：凱末爾不會聽命於任何一方，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正如土耳其史專家阿赫馬德所言：凱末爾的主要關注是，「不能再讓西方像對待奧斯曼帝國一樣，把土耳其當成半殖民地來對待，也不想讓蘇聯像個『老大哥』一樣資助安卡拉。因此，直到凱末爾逝世，莫斯科都平等地對待安卡拉，雙邊關係也保持了友好。」Feroz Ahmad, *Turkey: The Quest for Identity*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90。另外，關於這一時期的蘇土關係，可參見George S. Harris,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Turkey*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7), chaps. 3 and 4；以及Baskin Oran, ed., *Türk Dış Politikası*（《土耳其的外交》），vol. 1, 1919-1980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2001), chaps. 2 and 3。

管 濤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研究土耳其現代史；曾於2005年7月至2006年1月赴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黑海與中亞研究中心」訪學。